

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萧红

XIAOHONG

小说全集



20世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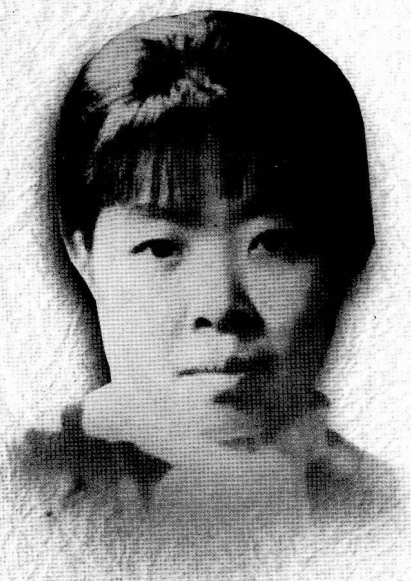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小说经典作家

ZHONGGUOXIAOSHUOJINGDIANZUOJIA

全集丛书

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萧红

小说全集



萧 红



萧红与生母姜氏



萧红摄于鲁迅家



萧红故居

靳国君 摄



萧红故居后花园

靳国君 摄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(1)
王阿嫂的死·····	(11)
广告副手·····	(21)
看风筝·····	(33)
小黑狗·····	(39)
两个青蛙·····	(43)
哑老人·····	(47)
夜风·····	(54)
叶子·····	(63)
弃儿·····	(66)
清晨的马路上·····	(83)
出嫁·····	(88)
患难中·····	(91)
访问·····	(94)
离去·····	(100)
渺茫中·····	(103)
腿上的绷带·····	(105)

太太与西瓜·····	(112)
桥·····	(114)
马房之夜·····	(127)
手·····	(135)
牛车上·····	(151)
家族以外的人·····	(162)
红的果园·····	(198)
孤独的生活·····	(201)
王四的故事·····	(204)
亚丽·····	(209)
黄河·····	(214)
逃难·····	(226)
山下·····	(234)
汾河的圆月·····	(263)
莲花池·····	(266)
孩子的讲演·····	(293)
朦胧的期待·····	(300)
旷野的呼喊·····	(309)
后花园·····	(336)
北中国·····	(358)
小城三月·····	(382)
红玻璃的故事·····	(406)
生死场·····	(419)
呼兰河传·····	(505)
马伯乐·····	(678)
编后·····	(924)

序

沈从文

在姑姑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，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部《萧红小说全集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出版社要我为这部集子写一篇序，这真使我忐忑不安。我虽说是姑姑的亲侄儿，但并不是萧红研究的专家学者，本无资格作序，但经不住出版社的热情鼓励，要我想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，不必多虑。这多少也卸掉了我的一些包袱，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姑姑 1942 年病逝于香港以后，其作品的出版和研究，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，一是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；二是七十年代末至今。

在萧红作品的出版方面，几十年来各种版本可达 40 多种，其中长篇版本可达 10 多种之多。此外，结集出版的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萧红选集》，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散文集《商市街》、《桥》和短篇小说集《牛车上》，上海杂志公司的短篇小说集《旷野的呼喊》，重庆大时代书局的《萧红散文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《萧红散文全编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萧红散文集，北方文艺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和《萧红全集》（第一部），中国广播电

视出版社的《萧红散文选》，哈尔滨出版社的《萧红全集》等等，再加上这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《萧红小说全集》，就有 10 多部集子，可谓洋洋大观矣。

在萧红研究方面，第一阶段主要是萧红生前好友所作，如郭沫若、茅盾、许广平、胡风、白朗、丁玲、柳亚子、骆宾基、聂绀弩、孔罗荪、梅林、靳以、绿川英子、史沫特莱、海伦·福斯特、辛克莱、鹿地亘、罗果夫等中外前辈们都发表了怀念追忆文章，介绍了他们同萧红交往的往事，写得栩栩如生，情真意切。待到第二阶段，特别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萧红研究才同复苏的中国文坛一样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“热”起来了。这期间，萧军、舒群、塞克、骆宾基、罗烽、白朗、端木蕻良、姜椿芳、蒋锡金、方未艾、梁山丁、关沫南、陈晔等老先生们发表了各种文章和谈话，起到了“放火烧鞋”的作用；新一代研究者们，如铁锋、钟汝霖、萧凤、葛浩文（美）、谢霜天（台湾）、尾坂德司（日）、中村薰（日）、前野淑子（日）、卢玮銮（港）、陈宝珍（港）、姜德明、陆文采、陈世碛、丁言昭、李计谋、李重华等后起之秀们，亦对萧红及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，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。据有关人士统计，近十几年来散见于各报刊发表的萧红研究方面的文章，达到上千篇几千万字，是萧红全部作品文字量的几十倍，几乎涵括了萧红生平的各阶段和全部作品，其中在国内外为萧红立传的艺术作品就达到近 70 部，现已正式出版的传记或传记小说达 16 部之多。不仅如此，萧红及其作品还引发了国内外影视界的关注，先后有《呼兰河的女儿》、《萧红与呼兰河》、《呼兰河与浅水湾》等 6 部电视艺术专题片在国内播放；有《萧红出走》、《落红赋》两部戏剧在搬上舞台的同时也搬上了屏幕；据说，现在还有三、四部根据萧红作品和生平改编的电影正在创作和

摄制之中。还有,应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,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,呼兰县委、县政府和故乡的父老乡亲已将萧红故居修缮一新,基本恢复了原貌,并于1986年对外开放。据萧红纪念馆馆长孙延林介绍,故居开放以来,至今已接待了42万多名中外游人,包括来自18个国家的4000多位国际友人。其规模和影响在与萧红同等位置的现代作家的故居或纪念馆之中,恐怕还是第一的。

我一直在想,姑姑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、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大小姐,在其短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,又仅留下百万字左右的作品,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当中,比她文学创作成就高的、影响大的、声望高的不在少数。然而,却很少有像她这样在死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厚爱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究竟是什么拨动了那么多人的心弦而经久不衰呢?是艺术的魅力,还是坎坷的生平?似乎是,也似乎不是。

萧红作品是现实主义的,这是中外评论家和专家学者一致赞同的。但在研究其作品主题和创作倾向时,却产生了一个怪圈,似乎可以自圆其说,又似乎破绽百出,使人困惑不解。在当前研究萧红的学术观点中,有一种认为萧红的思想倾向在写《生死场》时是健康向上的,反映了抗日斗争的主题,等到写《呼兰河传》时,尽管写作技巧提高了,思想性却下降了,这原因便是萧红后期脱离了民族斗争的主战场,掉进了自己寂寞的感情圈子里的缘故。但且慢,萧红在这期间又写了《北中国》、《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》、《九一八致弟弟书》等作品,表达了作者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持久斗争的激情,表现了作者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、八路军身上,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。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“假抗日真反共”的反动本质,给予了

无情的鞭笞。这做何解释呢？据此，另一种观点认为，萧红的思想在后期并没有颓废，她始终关注着当时斗争的时局，高举抗日的旗帜，“始终遥遥与革命主力驻在地的西北圣地延安的大旗所指相呼应的”。可是在其后期创作的两部长篇中，一部写了一个“目的是没有的，逃跑就是一切”的庸俗、卑琐的人物，另一部则勾划了辛亥革命后到“九一八”事变前我国北方的一个落后闭塞小镇的生活图景，展现了各类人物愚昧、混沌和麻木的精神世界。这两部作品都没有正面显现抗日斗争的主战场，其中《呼兰河传》似乎游离于激烈的抗日斗争之外，散布着一种寂寞、凄婉、梦魇似的情绪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萧红研究似乎被引入了“二律背反”的窘境。

在1993年呼兰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上，有两位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研究者，发表了一篇颇有新意的论文《巍巍耸立一丰碑》，尽管该文有些提法并不很准确，值得进一步商榷，但仍可给人一些有益的启示。作者从文学的本质出发，认为文学就是人学，歌颂高尚的人性，鞭笞低卑的兽性，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我国五四运动以来，一批先进的文学家摒弃了千百年来善善恶恶的老腔调，把目光转向了人。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中愚昧、麻木、听天由命、不知抗争等精神疾患，“怒其不争、哀其不幸”，以自己的文学创作，呼号呐喊，呼唤国人猛醒，改造国民灵魂，重铸民族精神。认为在这批作家中，成就最为卓著者，应当首推鲁迅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开创了文学的新纪元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和环境中产生的。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兽性和被压迫阶级的愚昧、麻木的现状，并选取那些最能表现这一主题的材料，来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。在写村民们因遭受压迫蹂躏的强烈刺激而产生的本能的反

抗时，也正是以此为生活背景，来表现他们“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”的蒙昧混沌的。该文因此认为持有“抗日作品”论的人显然是将作品的主题和作品的时代背景混淆了。《生死场》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农民在生死线上的挣扎，是同《呼兰河传》的主题一脉相承的。

这篇文章的新意恐怕就在于此吧。我们常说看问题应该全面地、历史地去看，如果孤立地、静止地看问题，那很可能是“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”。综观姑姑一生的创作，其特色基本可归纳为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，通过生活细节的“感性”描写来体现深邃的理念。她从来不在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外去创作那些简单地“图解现实”的作品，她的笔始终是“为人生”的。

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证明：在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中国社会，反帝和反封建是密切相联的，缺一不可的。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中指出：“中国革命的两大大任务，是互相关联的。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，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，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。反之，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，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，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，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。”

中国思想发展史表明：封建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长期横行无忌，是因为它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心理、风俗习惯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的。这种病态的“结合体”既表现在精神生活中，又表现在物质生活中。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这一点，认为“为政之要，辩风正俗为其上也”。历次入侵的外国统治者也很重视这一点，“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，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”。白种侵略者传教办学“以华治

华”；黄种侵略者鼓吹“同种同文化，要共同提携”。

姑姑一生经历了以“五四”运动为分界点的两个历史时期——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；体察了四类“政府”——张作霖式的、伪满康德式的、蒋介石式的、英属殖民地式的统治。她痛切看到这种黑暗统治带给国民灵魂的扭曲和危害，她认识到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构成了“无名、无意识的杀人团”，“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！”这些人物及风俗虽然在鲁迅和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的笔下已经出现过，但在东北特定的环境下，仍然给人以发聋振聩之感。她深深地感到，要推翻旧中国，要争取民族解放，就必须改变封建落后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，将人们从愚昧、麻木和保守中解放出来。

姑姑曾经向友人谈到自己对鲁迅小说的认识：“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。那些人物，多是自在性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，没有人的自觉，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，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”。（聂绀弩《〈萧红选集〉序》）姑姑在这里涉及了人的“异化”现象，当然她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对“异化”本质那样深刻的认识，她不过是“感性”地体验到这一点，但思想敏锐的姑姑却在其一生创作中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，宣称自己就是要“向着人类的愚昧开战”。特别是在萧红后期创作中，她更是师承鲁迅的传统，从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出发，笔锋集中地从各种角度刻划了令人毛骨悚然的“畸形的灵魂”，从而深刻地控诉和批判了黑暗的现实，表明了自己的阶级主张。

由此，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姑姑前后期作品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，不能人为地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割裂开来，然后说哪个斗争最主要，哪个斗争是次要的，并依此做为“思想颓废”的依据，或者根据作品是否描写了“现实斗争场面”，来判断作品

思想性的高低优劣,这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从《生死场》到《呼兰河传》,姑姑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,《呼兰河传》的诞生,正是作者探索人生的思想深化的结晶。至于说《呼兰河传》为什么充满了忧悒、寂寞的色彩,我觉得姑姑对此已经做了回答,她在《呼兰河传》“尾声”中说:“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,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,忘却不了,难以忘却,就记在这里了”。带着对黑暗现实清醒的认识去回忆往事,去回忆那“麻木而又愚昧”的生活,必然使作品的情调充满了忧悒、寂寞的悲剧色彩,因为这是将“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。

作家白桦曾评价说:“萧红这个人的思考从来不用理念的东西来写,这一点非常了不得。你看现在很红的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,他的哲学思考是用理念的语言写出来的,但是萧红完全用感性的、女性的、细腻的眼光,而且充满了情感来表达出她的很高的理念”。他又说:“我个人偏爱萧红,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如此深刻,三十年女作家独此一人。不久前我在澳大利亚讲演举例时,就谈到,我们过去对萧红的忽略,使我们的文学走进了一个奇怪的方向”。(冯羽《呼兰河畔访白桦》)他的这个说法是否可以回答一些萧红研究中的困惑呢?

在姑姑生平研究中,也取得了很大成果,加深了对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认识。但同时也存在着“猎奇”倾向。早几年在姑姑身世上造出了一个“养父说”,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的产物,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,而且大大贬低了姑姑的形象,似乎她的离家出走,不是对地主阶级的背叛而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佃户的女儿缘故。针对这种荒诞不经的“研究成果”,我在1982年第五期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》上,曾作文予以澄清,并经呼兰县有关部门和很多研究者的严谨考证,推翻了这个“假说”。但是这个

“养父说”给萧红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坏的影响，把当时研究工作的兴奋点转移到一些毫无意义的考据上了，损失是很大的。再一个就是炒“婚史”。有些文章和传记的作者似乎对姑姑的婚恋生活格外感兴趣，不厌其烦地渲染演译，论证一些细枝末节，其中个别的情节和人物对话完全是琼瑶笔下富家少男少女所为。这类作品，恐怕是追求轰动效应和商业价值的产物吧。

记得萧军伯伯、舒群伯伯和骆宾基伯伯还在世时，我几次到北京去看望他们，在谈到姑姑生平研究中出现的这些偏差时，我谈到了家人所回忆的一些情况，并表示了我的忧心。

萧军伯伯对此也有同感，认为我提供的情况有助于澄清某些事实，并表示他的作品以后修订再版时，可予以吸收。他说，研究作家应该着重研究他的作品。他又说，作家也是人，也得吃饭、睡觉，拉屎拉尿，何必在考据中如蝇逐臭呢？我在海北楼萧宅，将我收集的有关资料送给了萧伯伯的女儿萧耘姐，以供她在研究工作中加以思考。

舒群伯伯的谈话则带有理性的色彩。他主张要从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出发，来考察研究作家的生平。他认为，作家笔下的人物，都来源于生活，是作家根据本人的经历和观察，通过典型化创造出来的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为本人的自述。他强调，萧红之所以在作品中反映劳动群众，之所以成为人民爱戴的作家，同党的支持和扶持是分不开的，“那时二萧（指萧军、萧红）出《跋涉》没有钱，是我将跑交通攒下的 50 块大洋给了他们，这不仅是个人间的朋友行为，而是中共地下党对他们的资助”。

骆宾基伯伯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姑姑的音容笑貌，表示自己对姑姑是以亲姐姐相待的。他说，萧红在生活上是很严谨的，她

既是受害者，也是顽强的斗士，对她生平的考据应该实事求是地抱有同情心，不应该在她惨痛的伤口上再抹一把盐。

现在还在世的同姑姑有过交往的东北籍老作家不多了，对姑姑生前史料的发掘工作，恐怕业已到了“抢救”阶段。唯一还健在的与姑姑共同生活过的端木蕻良伯伯，可以说是姑姑从武汉到香港阶段的生活伴侣和重要见证人。他因高龄身体明显衰弱了，不能上下楼梯，只能扶着轮椅在房间里散步，以做锻炼。端木伯伯谈起姑姑时，心情非常激动，我不忍心刺激他的神经，可又不得不问及姑姑的往事，因为姑姑后期的创作及生活在其一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，且史料较少而议论又颇多颇杂。端木伯伯向我讲述了一些同姑姑共同生活的往事，他们如何到香港以及姑姑病逝前后的情况。他表示，待手头的几部稿子（指《曹雪芹》等）脱手以后，即准备着手写关于姑姑后期生活与创作方面的文章。对于萧红研究中对他的某些非议，他采取了一种“不予理睬”的态度。好在他的侄子曹革成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也在从事萧红、端木的研究工作，近些年来不断有新作发表，充实填补了一些姑姑后期史料的空白，使姑姑后期的形象逐渐真实而立体地凸现出来了。

姑姑在三十年代的哈尔滨从事文学活动时，曾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，现在他们的子女同我也成为了好朋友。由于地域的关系，我们同住在哈尔滨的来往比较多，像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、画家金剑啸烈士的女儿金伦及其爱人李汝栋，当年牵头房主人、画家冯泳秋的儿子冯羽等。还有在北京工作的，前面提到的曹革成和萧耘及其爱人王建中等，也常有音信往来。尽管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，却始终关注着有关东北老作家的信息或研究动态。我们这些与东北作家群有着血缘关系的后辈人，既为萧